



流浪狗横行,致使校园如险境,这理所当然就是管理者的失职。大学校园的内部空间天然存在着更鲜明的功能分区,这很容易留下适合流浪狗隐匿和活跃的“偏僻地带”。考虑到高校内的人员密度,狗患的危害性,势必会远大于一般的公共场所。

□然 玉

流浪狗校园伤人,安全与“动保”如何平衡

5月1日,湘潭大学一女生在校园内遭到成群流浪狗撕咬,事发后该视频在网上流传。湘潭大学相关负责人称,受伤女生在接受治疗后,现已返校学习。该校通报称,5月2日还有另一起女生遭狗咬的事件。一名湘潭大学的学生告诉记者,事发地点平日就有很多流浪狗活动。学校表示,已经组织人员对学校的流浪狗进行清理、驱赶。据悉,该校保安去年也曾打狗,遭学校动保协会声讨后停止行动。(5月3日《新京报》)

在一个注意力极其稀缺的年代里,一起看似普通的“狗咬人”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公共热点,必然有

其道理。有视频为证,发生在湘潭大学的这一“事故”,其场面实在大过惊悚。深究其前因后果,则更是令人唏嘘不已。作为这场悲剧的主角,被一群流浪狗围追撕咬的女生,到底经历怎样的恐惧与痛苦?对此,我们虽不曾亲历,但大致可以想象。而我们所不能想象的是,如此小概率事件,在短短两天时间里,居然在这所大学里密集发生——那么,到底是被咬的人太不幸,还是没有被咬的人太侥幸,就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了。

据媒体调查,湘潭大学西北角原本就多流浪狗集聚,并且这一现象已然由来已久。然而,面对这一

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,该校的安保部门并未采取有效应对,放任纵容之下,终于酿成今日恶果。流浪狗横行,致使校园如险境,这理所当然就是管理者的失职。常识是,大学校园的内部空间天然存在着更鲜明的功能分区,这很容易留下适合流浪狗隐匿和活跃的“偏僻地带”。而考虑到高校内较高的人员密度,狗患所产生的危害性,势必会远大于一般的公共场所。

两天连续发生两起流浪狗伤人事件,又一次说明了大学空间的特殊性,以及狗患在其间产生的放大效应。其实,湘潭大学的管理者对此并非没有判断,据其自身所言,

“保安去年也曾打狗,遭学校动保协会声讨后停止行动”。这一说辞看似很委屈,但实则颇有甩锅之嫌:若是从履行职责、保障安全的立场出发,该校安保部门完全应该力排众议,强势执行既定计划;就算是为了避免冲突,也可以采取更具技巧性的手段来治理狗患。

通过对特定区域实施空间改造,来压缩适合流浪狗活动的地带;配备专人高频巡查,有针对性地实施驱离;动员所谓“动保人士”对流浪狗进行规范性喂养和救济……凡此种种,原本都是可以尝试的安保方案。可湘潭大学仅仅因为“有人声讨就停止了行动”,这种

摇摆不定的管理思路,并没有坚持应有的担当。事实再一次证明,在“不出事就不管”的心理下,出事几乎是必然的。

维护校园公共安全,从来都是一种不容讨价还价、不容变通执行的刚性义务,也是最优先级的价值目标。当然,大多数情况下,我们实在没必要非得将“公共安全”和“动物保护”摆在对立的位置上。更多的时候,秉持不同立场的群体,需要的只是一点真诚的沟通和彼此的谅解。毕竟,只有充分尊重了人的权益,才能尽可能给动物争取利益;偏激而偏执的观念和行动,永远只会适得其反。

公民发言

通过正规渠道报废一台小货车或小轿车,车主仅可得两三百元,甚至连油费、拖车费都不够。然而在黑市上,仅小汽车方向机就可卖500元以上,成色较好、品质较高的发动机甚至可卖五六万元。

治理报废车“报而不废”要多措并举

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,截至2017年底,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2.17亿辆。相应的,汽车报废量也不断攀升,市场调查机构智研咨询测算,2018年我国报废汽车数量预计907万辆。

如此多的报废汽车都流向了哪里?记者调查发现,流入正规拆解企业的报废汽车不到30%,一些报废汽车经无从业资质的“黄牛”之手流入黑市,改头换面后重新上路行驶,留下安全隐患。(本报昨日15版)

根据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的规定,当汽车达到60万公里数等条件时,应送到有资质的企业拆解报废,拆解下来的发动机、方向机、变速器、前后桥、车架等“五大总成”禁止违规出售,应作为废金属强制回炉。安全性能低劣且无法修复的报废汽车,一旦经无从业资质的“黄牛”之手流入黑市,改头换面后重新上路行驶,极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,这方面的“血的教训”,并不鲜见。

既然报废汽车“报而不废”的危害几乎人所共知,为何流入正规拆解企业的报废汽车那么少?说白了,乃是利益驱使。据报道,通过正规渠道报废一台小货车或小轿车,车主仅可得两三百元,有的需要自己开几百公里去报废,或自找拖车拖过去,换来的几百块钱连油费、拖车费都不够。然而在黑市上,仅小汽车方向机就可卖500元以上,成色较好、品质较高的发动机甚至可卖五六万元。

而正规拆解企业对报废车流入黑市也无能为力,因为它们自身本就生存艰难,人家“吃肉”,它们只能“喝汤”。何以至此?一业内人士曾在知乎介绍,拆解报废汽车很难盈利,因为所拆零件大多数旧到不能再用,要

卖“五大总成”又违法。汽车也没有太多值钱的贵金属,拆解下来的产物收入基本冲抵不了拆车成本。最可能的盈利模式来自于政府补贴,然而补贴往往不到位甚至几乎没有。

由此观之,要减少甚至消除报废汽车“报而不废”、流入黑市现象,最需要重构利益格局。一方面是提高车主报废汽车的利益回报,比如由相关部门给予补贴,像北京就曾推出过“2017年6月底前淘汰老旧机动车,可多得政府补助2000元”的政策。据说在未来,报废汽车有望不再按吨计价、一称了之,而是“一车一价”,由市场自主协商定价。这也有助于激励车主走正规渠道报废汽车。

另一方面,还要对正规拆解企业给予较大的财政补贴,以支持它们发展,以更大动力、更优质服务做好报废汽车回收工作。近年来,不少正规拆解企业在废钢价格下滑之下,经济效益也下滑得厉害,存在较大的经营压力,甚至处于亏损状态,又如何与黑市争抢报废汽车资源?在提高补贴之时,还要扶持一些龙头企业做大做强,精细规范地服务,以终结正规拆解企业小、散、乱、差的局面。

当然,相关部门还要在全社会加大宣传力度,让车主意识到,将报废车流入黑市,改头换面重新上路,一旦交通肇事,原车主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因为发动机、方向机、变速器、前后桥、车架等“五大总成”带有独一无二的识别码,可凭此追溯到原车主。也要严厉打击铤而走险、违规交易的车贩子及黑市经营者,有必要课以重罚,因为那些重新上路行驶的报废汽车,无异于威胁公众安全的“定时炸弹”。 □李秀荣

当今的中国人横跨农业社会、工业社会、信息社会、智能社会等数个反差鲜明的社会形态,有些人即使住进了现代化的高楼,精神世界却依然停留在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。

公共直饮水也是一面“镜子”

为了让市民在外出游玩时能喝到放心安全的饮用水,2015年,相关部门在云南昆明市翠湖公园九曲桥附近设置了公共直饮水机。但有不少市民却带着大量空瓶去装水,而有的人甚至在用饮用水洗手、洗脸。(5月3日《春城晚报》)

直饮水机作为免费提供给公众的公共产品,不仅品质上值得信任,也能够就近满足民众的需求。但是,部分市民缺乏规则意识与公共精神,让开放、共享的直饮水机陷入“公地悲剧”。

公共直饮水成为“唐僧肉”,那些拿着几个瓶子“有备而来”的市民或者带着小推车用两三升的大桶来接水的老人们,当真是为生活所迫的弱势群体?其实,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来占小便宜的,往往并没有那么贫困。

当前,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了,但农村的休闲娱乐文化资源,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,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赌博活动对村民的诱惑力。一些赌场经营者,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趁虚而入的。

遏制农村赌博之风,执法与服务都要加码

当前,赌博之风在部分农村地区未得到根本遏制,新型赌博快速扩展,传统赌博方式也近乎公开化。有农村地区地下赌场定期向保护伞交保护费。赌场每月按时交保护费1万元,这样派出所就不会前来查赌场了。(5月3日《半月谈》)

赌场抽水、马仔看场子、配巡逻人员放风……这样的赌场在农村存在,显然堪称公害,不仅影响社会风气,一些村民参加,也间接构成了对本来就不高的收入的收割,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,不能不高度警惕。

按理说,在农村地区搞这样的赌场,很难掩人耳目,要查处的话会容易很多。但报道却发现,这些赌场之所以能够在农村近乎公开化的做大,关键就在于

笔者的小区里,有一个商业化的直饮水机,一桶7.5升的直饮水,只需要花1元钱。每天都去接几桶免费的公共直饮水,省不了几块钱,为何一些人依然乐此不疲?一些人在物质生活上已经摆脱了贫穷状态,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上却依然停留在贫穷状态。有便宜不占白不占,更何况是公家的东西呢?

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·韦伯认为,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。将公共直饮水带回家的人们,既影响了别人使用直饮水,同时也占了公家的一点便宜;看似理性,实际上并不理性。没占到几块钱的便宜,自己却花了不少力气在运输上,还承受了别人异样的眼神而有损“脸面”,说到底其实是因小失大、得不偿失。

急剧的社会变迁,导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发生时差;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当下,一些人的精神家园建设却“慢一拍”。不论是“阳台养鸭”,抑或“闹婚”,当今的中国人横跨农业社会、工业社会、信息社会、智能社会等数个反差鲜明的社会形态,有些人即使住进了现代化的高楼,精神世界却依然停留在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。有便宜不占白不占作为一种“生存理性”,甚至浸润了一些人的价值观。

有些看起来损人利己的行为,其实自己也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。对于我们来说,只有懂得互利共赢,只有愿意在内心里给其他人留一个位置,公共生活才会更加美好。

□杨朝清

相关执法者也被“腐蚀”了。如有农村地区赌场每月按时交保护费1万元,这样派出所就不会前来查赌场。

由此可见,赌博之风在农村的蔓延,首先是执法力的不足。一方面,农村的“近邻”型社会,执法者很容易与“违法者”发展为“熟人”关系,如果不具备拒腐防变的能力,便可能被利诱到同一条利益链条中。另一方面,农村的某些执法者被“腐蚀”,也在执法资源的配备不足,削弱了“同级监督”的可能性。

当然,赌博之风在农村成为一个突出现象,也不得不反思农村的文化建设。当前,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了,农村地区的硬件设施也在改善,但农村的休闲娱乐文化资源,还基本处于空白状

态,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赌博活动对村民的诱惑力。一些赌场经营者,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趁虚而入的。无论是对当前农村精准扶贫,还是乡村振兴,这都是一种提醒:农村的休闲文化建设,不容忽视。

因此,短期来看,要加大农村对农村赌博活动的清理,特别是涉及执法者本身被“俘获”的赌博案件,更要严肃追究相关“保护伞”的责任,同时增设有效的举报鼓励渠道,增加对赌博的社会监督力量。从长远看,则要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农村警力的配备和执法资源投入,形成对违法活动打击和普法的机制性保障,并推动文化资源和服务向农村地区的下沉,增加农村社会对赌博的免疫力。 □朱昌俊